南阳解放前的行帮与商会会长

王 炳 申

清代末年，全国的私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为了便于统一管理，研究业务，开展生产，交纳税捐，大都按照行业性质分别组织成帮会。南阳也成立了不少帮会。手工业有毛笔、铜器、木铁（木匠铺、铁匠炉）、竹器、草绳等帮；商业有铁货、中药、杂货、时货（百货）、丝绸等帮。南阳经营铁货的大部分是怀庆人（沁阳），称为怀帮；杂货、丝绸两个行业经营范围比较大，全城有杂货商店一百多家。若按现在划分方法，可包括好几个公司，即化工原料、五金交电、土产特产、酱菜食盐、烟酒副食、农具陶瓷等等。杂货帮设有办公机构，在东关琉璃桥北头路西大王庙，每年农历九月初一，在那里唱戏三天，全体成员集会聚餐。帮长是曹天一，他经营的是谦祥颜料纸烟公司，地址在白衣堂街路南（现新华街）。他经营的性质是交押金，代销外商颜料、纸烟，资金约有银币五仟余元。丝绸行业有坐商十多家，他们资金雄厚，大部分做外贸生意。其中有两家是上海丝绸垄断者沈子钗投资的。丝绸商行连同丝绸作坊共有一百五十多家，他们常设的办公机构，在南关大寨门内路西三皇庙里。每年农历九月十五在那里唱对台戏，全体成员（包括织绸工人在内），放假三天，中午都在那里集会聚餐。帮长朱文轩开设意盛明绸缎庄，地址在常春街路东（现解放路），是一家内字号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资金银币约八仟余元，成员有十多人。帮会也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主要是利用行帮排斥外来者，称为行帮把持者。

辛亥革命成功后，大城市商会先后相继成立，南阳商会是一九一七年开始建立的。第一任会长叫杨松岑、外号杨六爷。他开设瑞丰酿酒厂，又称蒸锅，地址在南关大街路东，后门靠白河边寨墙。现在南关东家后的那一米来宽砖券小寨门，就是当时杨松岑为了蒸锅使用白河水而开的。他还在南召杨树沟开采小煤窑，两下共有职工五十余人，资金约银币七仟余元。一九二〇年谢章甫接替杨松岑商会会长。谢系清末谢恒武的胞弟，谢章甫在商水县任过县长，卸任后，回南阳经商，在南关大街路西开设裕发恒杂货店，主要经营食盐。他资金约五仟元银币，成员近十人。到一九二三年姚池一任商会会长。姚的商号叫富顺绸缎庄，它是内字号，地址在孙家楼街他家里。自一九二六年开始曹寿岑担任第四任县商会会长。曹经营的也是绸缎业务，有资金约银币近万元。地址在南关大街路西，商号泰丰。他是个资方代理人，东家是南关大富户杨八少。曹因病只干两年辞职。一九二八年开始接替曹寿岑的是先梯升，任县商会会长。他经营的是意聚恒钱庄，地址在东城门内路北。资金约银币五仟余元。他当时与南阳驻军冯玉祥部第五军军长石友三要好。先于一九二九年随石部离开南阳，随石外出，会长由其弟先吉文代理。一九三一年，为商会特别捐，先吉文与南阳团队司令马德乾发生冲突，马把此事呈报给南阳驻军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（字伯英），张以抗捐罪名将先吉文枪毙。一九三二年，先梯升回到南阳，扬言要为其弟报仇，后被鄂豫皖三省缓靖督办刘镇华定为土豪劣绅罪枪毙。一九三三年王谦益继任县商会会长。王经营的是文化纸张办公用品，商号名称协记书

局。还代销上海世界书局中小学校教科书，是南阳最早使用四开铅印机的，资金约银币七仟余元，成员二十余人，地址在南阳瓮城内路西。王因吃素食，又善盘剥，外人称他“狠头斋公”。一九三六年开始乔吉甫继任县商会会长，已是第七任。乔经营颐和百货商店，资金约银币五仟余元。乔与官府关系甚深。到一九三九年开始王谦益又接任县商会会长。王善于请客行贿，才又当上了会长。一九四三年张松山接替王谦益任商会会长。他经营的是百货商行，商号叫锦新，地址在东粮门南边路西，资金银币约三仟余元。他是一个纯粹商人，与官府没有拉拢，张为什么会当上会长呢？因王谦益早年贩毒品——大烟，被南阳缉私营押送武汉，判刑一年。乔吉甫为了不出税捐，把颐和商店改称为颐和合作社，对外称为官生意，在第九届南阳县商会选举时，南阳著名黑讼师协成裕食品店经理万子全当场对王、乔二人进行弹劾，声称王判过徒刑，乔是官生意，他俩都不能任民间商会会长。在场监选的县党部监委郭超岳无可奈何，只好选排名第三的候选人张松山为会长。乔吉甫到一九四七年又担任第十任商会会长。乔与当时南阳县长赵芝庭是儿女亲家，在赵的支持下，乔又当上会长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，南阳解放时，乔随王凌云南逃，后在赵寨砖瓦窑劳改场劳改，期满后留厂就业，现已去世。

注：此稿是王炳申和八十六岁老人盛得君，八十四岁老人刘湘波一起回忆后撰写的。

从店员到参加革命

朱之光口述

梁哲生整理

我是辛亥革命那年，出生在南阳城内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里，我父亲朱修华开一个作坊，专给人家织绸子。在我幼年的时候，家庭虽不富裕，但一家人尚能糊口，使我有机会上了几年私塾，名字叫朱三纲(以后改名叫朱之光)。以后因丝绸生意日渐萧条，家庭生活也逐渐困难，为了生活所迫，我不得不辍学，走上自谋生活的道路。

一九二八年，也就是我十八岁时，我父亲央人说合，叫我到本城内长春街（现解放路）“恒升明”西记绸缎庄当学徒。当时议定是四年满师，待去了之后掌柜杜天顺，不是叫我学活，而是把他家的一切杂活，统统压在我身上。有时股东韩汝卿、姚实卿家里有红白喜事，我们当相公的也得去做活，甚至接叫他们的姑娘也叫我们去。每天在铺面里，铺床叠被，倒夜壶扫地抹桌子换烟得水，这是早晨起床照例要做的活。晚上非熬到十二点才能睡觉，有时柜台便是相公们的床铺。有一次我累得实在支持不了，就站着打起盹来，由于疲劳过度，困乏不堪，就一头栽倒在火香上了，结果把我嘴角上烧了个泡。现在我嘴角上这片斑痕，就是那次烧的。

每天凡是人家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当相公的得站一边侍

奉，等人家吃完了饭，才能到厨房里胡乱吃一点残汤剩饭，又得赶快到柜台上招呼客人或顾主。夏天顾客一来，不管是什么样买主，也得给人家打扇子，如果侍奉不周到，还得挨打受气。在旧社会当学徒，真算是吃尽了苦。

掌柜杜天顺是个视财如命的家伙，他一看伙计、相公们吃有油水的东西，或者是放盐多了，他就骂人，说是抛费了。他对伙计、相公们特别苛刻，他整天只恨你干活少。我记得在他的作坊门上写着这样一幅对联：

有一刻闲须勤吾业，
无十分事莫出此门。

这幅对联，如果贴在学生书房门上，那是非常适合的，可是杜天顺却让贴在伙计、相公们干活的作坊屋门上，其用心多么狠毒，我们看了气恨极了。

一九三二年，杜天顺的“恒升明”绸缎庄在西安设了个分号叫“瑞升祥”绸缎庄，由股东杨金三去招呼，杜天顺叫我去当学徒。

到西安后，杨金三叫我染绸子、站柜、跑外卖，每天虽然劳累些，但总算摆脱了那些繁重的杂活，谁知好景不长，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，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，商业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萧条。那时日货大量倾销，充斥市场，形成货物倒流。不久“恒升明”在西安的“瑞升祥”分号便倒闭了，我只好又回南阳。

这时“恒升明”在开封等地所设的几处分号，也同样的关门了。由于生意倒闭，自然人浮于事，掌柜嘴上不说叫走，却在等待时机，寻找岔子一脚踢开。

后来杜天顺终于找到了借口，一九三六年正月初一，他叫我帮助他给三皇帝（财神），摆供果的时候，突然问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三纲，有余（鱼）没有？”我也不加思索，只想的是上供用鱼，就应声答道：“没有鱼”。谁也没有想到听了我说的这句话，杜天顺竟然两眼一瞪，胡子一翘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混蛋，滚开！”过后我才醒悟过来，他问话的意思是想叫取个“吉庆有余”的吉利话，我却说了个“没有鱼（余）”这便惹他烦恼了。象这样无事生非，故意找岔子，谁能防备得了呢！就这样二话不说，一过了正月初五，便把我开销了。我当了八年学徒，干了八年无偿劳动，就这样被一脚踢开，从此我失业了。

这是1936年的事，那时我已经二十五岁了，整日在家里思想着在绸缎庄当学徒时，从染绸到站柜算帐，跑外卖，我都能干下来，原想着有朝一日熬个有工资的把式，谁知干了七、八年，竟落到这个地步，真叫我啼笑皆非，有苦难诉。在这时心想着做生意吧，没有本钱；到乡下种地吧，穷无立锥之地，这叫我干啥去呢？

在这走头无路的时候，我想起了在西安当学徒时，驻防的杨虎城西北军中，有不少南阳人，他们常常光顾“瑞升祥”，有时他们在那里喝酒、打牌，我侍奉的也不错，一来二去，我也结识了不少官兵，有个南阳人叫张羽甫，是扬虎城部下的参议我想去西安投奔他，或许还能找碗饭吃。这时正巧碰上张羽甫的老婆也要去西安找他丈夫，正发愁没有同路人，她一听我要去西安，喜出望外，我们一商量作好准备便上路了。到了西安，张羽甫一看我把他老婆送去了，非常高兴，就把我留在他家当个使唤。张是一位建筑家，此时他正在为杨虎城设计一套公寓名叫“止园”。我就在他家做杂活，有时帮助他晒图纸，量地皮。就这样我算混着有碗饭吃了。但我也总觉着如此寄人篱下，终究不是长远之计，还是打算着找个正当的事干干，才是正路。

后来张羽甫私人买了两部汽车，叫我去招呼。到这年八月我父亲病故，我回南阳一趟，在埋殡我父之后，于十月间又赶紧返回西安。一九三七年正月初一，我去张羽甫家拜年，张羽甫的老婆一看见我穿的是白鞋，就火冒三丈，气呼呼地连声说："臊气、臊气！"她就照我脸上"呸呸"吐了一脸吐沫，马上叫我滚出去。当时我气得鼻脸乌青，实在气恨之极，一怒出了她的宅院。我心想父亲去世了，不但没人安慰我，相反为给父亲守孝又惹人家不高兴，招致了祸端，自然伙计当不成，饭碗也就打了。

此时，杨虎城的第十七师师长赵树山，办了一座半公半私的"裕记"铁工厂，我通过南阳的老乡刘俊甫介绍到铁工厂去干活，每月十元工资，除了伙食外，还有两元余剩，这也满足了我的心愿。

"西安事变"前后，西安市面上反日爱国空气很高。每天成群结队学生和东北军、西北军的官兵走上街头，宣传抵制日货，并公开讲演，联共抗日，一致对外。在张、杨扣押了蒋介石之后，周恩来同志到西安进行调停，说服张、杨，迫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条件，这使我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很大的，心想国共合作了，跟着西北军也算是为国家为民族出力了。

不久，赵树山部奉命北上抗日，我就决心随西北军上前线打日本，不料铁工厂不让我去，我就暗暗地把帐目一结算清楚，留下一封辞别信，单身一人追到石家庄，找着辎重营营长王希孔，他看我态度坚决，叫我在二连当了个上等兵。赵部后来移防保定市，我在那里亲眼看到了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。记得那是一个白天，来了四十五架敌机，这时我在车站上，看见有好多人蜂拥似的往防空洞里钻，结果敌机就照

着那个防空洞口和防空洞上轰炸，钻进防空洞里的人一个也没有跑出，全部死在里面，据说死的人就有五百多，尸体也无法扒出。

到晚上，不知又来了多少架敌机，只听上空一片怪叫声。这次我隐藏在郊野的一条小河边，不料敌机在郊野地方也轰炸起来，崩得我满身灰土，好在我爬在那条小沟边，没有丢炸弹。

不久赵树山部开赴曹河，正面迎击敌人；关林征部在侧翼掩护。敌人一看正面打的顽强不易进攻，便集中兵力，猛攻侧翼，关部溃退，敌人从侧面包围过来，致使赵部腹背受敌，只好从保定撤退。我们辎重营的车辆，在忽忙的撤退中全部丢光，全营官兵也被冲散。我和连长陈荣枢连夜跑回石家庄，住在郊野的一个村上。我们一时找不到队伍，连长就给我三块钱路费，叫我还回西安到铁工厂。谁知回到西安以后，铁工厂也不愿再收留我了。这时我心想：从我在绸缎庄当相公（店员）到在张羽甫家当伙计，直到在“裕记”铁工厂当雇员，其结果尽是这样不声不响被解雇了，真叫我有苦难诉。

正当我走头无路的时候，听说西安正北有个云阳，那里有共产党办的“抗日青训班”。由于在“西安事变”前后的宣传教育，使我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，就下决心去云阳找共产党，到抗日的最前线去。我到“抗日青训班”见了负责人胡乔木和冯文彬，叫我写个简历，他们看后没把我留在“青训班”，冯文彬写个介绍信叫我去延安“抗大”学习，从此，才使我得以踏上革命的征途。

宛城商业字号招牌琐谈

马 俊 乾

商业的字号、招牌，多取于吉庆、祥瑞、发达、兴旺等宏亮的字、词，用绸缎刺绣，木刻，雕塑，绘画等手法制成招眼的招牌。特别是一些富商大贾，取字号名称慎之又慎，制作招牌力求华丽招眼。往往为取一个称心的字号名称，不惜招待报酬，聘请文人，书法家起名、书写。一旦商业开张，字号被启用，便用字号进行经济往来，商品交易，以信用维护字号的声誉。对招牌，被看作是生意兴隆、衰败、倒闭的象徵，具有与店铺共存亡之重要。所以则严加爱护，禁忌损坏或污染。但是一般的商业店铺与个体商贩，由于资产所限，对字号、招牌不那么讲究，多是以经营的行业随便取一名称，以商品实物或模型作招牌来招揽顾主，从而使商业出现了绚丽多彩的字号，千姿百态的招牌。历史的积累了民间文艺财富，从中不但楼测出当时商业的兴衰概况，而且还可以探知时代与习俗的变迁。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，琐谈南阳市的字号、招牌，对知道一个城市的过去，认识集市的现在，是稍有裨益的。

具有千年历史的南阳市，它不仅是当今全国屈指可数的历史文化名城，而且是汉代显赫全国的五大商都之一。享有："宛周齐鲁，商通天下，富冠海内"的美誉。尤其是它处交通四达之地，南船北马，东轺西驼，商贾八方会合，在带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了商业繁茂的同时，使商业字号、招牌形势更加丰富——南风北俗兼而有之，但惜历代的文人，史学家，不屑一顾，不载于史、志，现仅以解放前目睹耳闻的南阳商业字号、招牌为蓝本，略述其梗概。

在南阳市的市面上，各个商户都有一个招牌、字号，但取意各有不同：有按行业取名的，有按方位地址命名的，有以经营者姓名取的……等，各式各样，不胜枚举。

一、字号（挂出者称招牌）

1、以祥瑞为名的："鸿康"绸缎庄，"复和庆"绸缎庄。

2、以商品特点为字号的："经纶"绸缎庄。

3、以行业特点为字号的：

①浴池，多以水洁身取名：玉香泉，华毓泉，一清香。

②饮食业："吃吃看"饭店。

4、祝福性的：万生福药店、济康药店，予祝病人康健。

5、以历史名人轶事取名的：

同仁堂药店：以汉代医圣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，坐堂行医的事迹取"堂"字为字号。

6、表示生意兴隆的：

恒永粮行，恒丰粮行，大发大玉器店，德发德玉器店。

7、以姓名为字号：

鲁景申文具店，王明泰笔店，万兴东药店（经理为刘万兴），雷氏馄饨馆，阎天喜饺子馆。

8、反映时代现状的：

中国笔店，时代饭庄，中国饭店。

9、沿袭总公司字号的：

商务印书馆，中华书局。

二、招牌：各商店除用“字号”制成各样的招牌外，另有以表现经营行业的特徵用图象、实物或模型作招牌的，俗称招子，幌子，其种类有：

1、张罗业：门口悬一罗圈。

2、酒肆：门口悬一绣（画）酒罈或酒壶的酒帘。

3、膏药店：门前悬一膏药模型。

4、理发店：门前悬一绺头发。

5、修自行车铺：门前悬一车子圈。

6、寿衣店：门前悬一“寿”字或张挂一件寿衣。

7、当铺：门口悬一“当”字。

8、纸扎铺：门前悬一风筝或纸马。

9、化铁炉：门前悬一铁车轮或画一车轮。

三、游动小商贩：

1、卖布郎：俗称货郎担。手执鼗鼓子，走乡串户，进村中，摇动鼗鼓作招子，招引顾主。

2、针线杂货郎：手执鼗鼓，上连云锣，两边繁梢，摇动时，鼓、锣齐响，借以招唤顾主，俗称摇叮噹。

3、兽医（阉割）：手执铁孤形钳，长木柄，一柄端为孤形，雕龙头，安两绺马尾须，走乡串牲畜市，招揽生意。

4、算命先：手敲竹板。

5、油盐贩：以敲木梆为标记。

解放后，在移风易俗的改革中，一些陈规陋俗自行取缔，商业字号、招牌，一般不以吉祥、发财为内容，除个别商号：如万兴东，济康，泰兴源沿用旧字号外，多以经营行

业及同行业排次为商号，如南阳市百货公司，下属商店称"第一百货门市，第二百货门市部；以街道名称为字号的有：东关日杂门市部，南都宾馆，新华影院，梅溪影院，梅溪宾馆；以山川为字号的有白河宾馆，独山园艺场；体现人民大众的字号有人民像室，大众影剧院，群力饭店；含有政治主义的字号有东方红影院，八一机械厂；其它以行业特点为字号的有美容理发厅；以大自然为字号的有宇宙像室……等。

文革后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，以及个体商户的出现，商业字号亦有新的变化，一般较大的商店多以"货栈""中心"为字号，如：南阳贸易货栈，南阳工贸中心。伴随改革开放复又出现了古老传统——以优美词作为字号的商店，如："皇冠酒家"，"白天鹅"舞厅，"艺雅斋"书画室……等。所用招牌多用金属品制作，以霓红灯衬映。这些含有诗情画意，五彩缤纷的招牌，不但展示了古老城市新姿的一个侧面，而且也显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斑点翼彩。

总之：字号、招牌是时代的产物，它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商业的兴衰而更新，不时的有新的招牌出现于市面，所以我们若注意搜集整理，乃是为后人研究南阳的变化，积存了可贵的资料。

宛城金融业的演变

刘寿仙

南阳古称宛城，亦叫南都，是予西南的名城，平原沃野，产物丰富，楚时冶铁业发达，秦、汉间市设商贸昌盛，万商云集，金融业形成较早。明嘉靖年间，南阳府内设“交钞库”收缴商税，兑换“交钞”，富有当铺业已经兴起。清末民初以来，经济更替兴衰，金融业亦随之起伏多变。兹将官设民商金融业分述如下。

一、民间金融业

（一）典当业

典当业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金融机构，是以物品作质押的高利贷借款形式，最早的典当业叫做“质”或“质库”，产生于汉代，南北朝至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，宋朝称“质典库”，到了明朝叫“典铺”、“解典库”、“解当铺”、“解库”、“典当铺”，后来就通称当铺。

典铺业的资金较大，受当范围广，皮裘、衣被、金银首饰、古董珍宝、名人字画、地契文约、莫不尽有。当物价格按不同种类作价，一般在押品价格的五成左右，陈旧物品的价格更低，金银首饰折价六、七成。受押物品成交后，付以收据，称为“当票”，载明品名数量，价款及当期。当期，一般为三至六个月，也有一年或二年的。年息一般三分左右，若到期不赎者，即为“死当”，当铺有权拍卖处理。

南阳为东汉光武故乡，交通便利，百业兴旺，诗人李太白《南都行》就有“白水真人居，万商罗鄽阓”之诗誉。宛城当铺业的发展，据《南阳府志》载：明嘉靖年间，编修府志时富有铺即存在有捐银十五两的记载。清乾隆五十九年（一七九四年）南阳医圣祠捐款碑文记载：宛城已有“富有”、“德裕”当铺。嘉庆十五年，富有当经理范光国一次吸收南阳县乡试存款一千二百两纹银。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一年）重修武侯祠玄石坊碑文中载有“富有当”、“世德当”、“经纶当”三家捐款。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年），南阳府志原文中载：“富有当铺”捐银十六两。据六位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回忆，光绪末年，富有当铺在东门里，仍然生意兴隆。经理是杜子家，山西人，资本约有纹银六万两，其半数是当过南阳知县杜子基（杜子家的族兄）的私资。当时质典的范围有：珠宝翠玉、金银首饰、皮毛绸缎、衣被、古董珍玩、名人字画、地契文约，及一些珍贵物品，当物计价，是一言堂（当铺说了算），实无标准，主要看质物出手难易，新旧程度，是否名贵，一般是旧物半价，最高不超过七成，当期有半年，一年，一年半，最长不超过两年，到期凭当票付清本息，取回质物，凡当物期满后一个月不赎者，即为“死当”，当铺有权拍卖。当物“作价”和“死当”，乃是典铺对出当者致命的剥削伎俩。当票书体，亦古怪异常，行草兼别字、术语、形音不类，耆儒难谙，既防假冒，又可欺诈，此种“当书”是典当商的又一剥削之伎。

富有当铺，资力雄厚，经营年久，除收当息外，主要靠出售一些死当物品，而获得厚利，其次是经营金银、铜钱兑换，碎银铸宝，群众称之为“银钱局”。有时还代县府向京城承解税银，生意颇为兴隆。从业人员达八十多人，房屋一

百二十余间，内部分设掌柜、司柜、把式、相公（学徒）护仓班等，管理严密，但苛罚至甚，如不敬子神者也要罚，（敬子“鼠”神，禁童扑击鼠）。民国元年（一九一二年），二月一，即正月初一，由季雨霖，马云卿率领的“河南旅鄂奋勇军”抵达南阳城下，被吓破了胆的南阳镇总兵谢宝胜，绰号谢老道，南阳知县文在方，弃城西逃。驻城守军哗变，纷纷改装闯入商店抢劫，富有当铺，由于残酷剥削，民怨甚多，一些人趁机将其抢劫一空，残物，铜钱散乱满街。后经整顿，勉强开业，终因资金人力不足、业务不佳，加之战乱，匪患和赋税过重等原因，于一九一八年又复倒闭。断续经营约三百余年。

清末时，除大当铺外，尚有一些资力较小，又无门面的家庭小押当七家，如：胡业坑的温德庆、西门里的陈朱氏，鸭子坑的王福全等和一些走街串巷的跑当人，设摊代当铺拍卖的叫喊者。

典铺业历史悠久，对人民剥削残酷，唐代诗人白居易，在其《长庆集》中已有“走笔还诗债，抽衣当药钱”。当时宛城也有流传，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民谣：“夏当冬服，冬当单，这交物品那交钱，穷富不嫌，当铺赚钱”。当铺是金融业发展史上一种产物，伴随着剥削制度的灭亡而呜呼哀哉。

（二）钱庄（银号）票号

钱庄、票号是经营货币信用较为齐全的民间金融业，办理存、放、汇和金银买卖与兑换货币，而且还兼营丝绸、烟叶和百货。

晚清几十年间，是钱庄的鼎盛时期，由隐转现相继而设，正值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入侵之际，伴随着埠际贸易的发展，金融业务日益发达，票据开发交换日增，庄票、汇

票等票据种类尤多，民国初年基本上已具相当规模，成为较完善的民间金融机构。

清乾嘉年间，宛城为四川至北京驿道要街，地居白河盆地中心，土地肥沃，农业经济发达，白河环流而下，直通襄樊、武汉，宛属和外埠土特产品多在本城集散。千余年来，客商云集，市贸繁盛，为银钱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钱庄票号相继出现和繁荣。

据乾隆五十九年（公元一七九四年）重修南阳医圣祠“春庄亭”捐款碑文记载，当时已有日升、义发、大顺、隆盛、裕升五家钱铺，捐款额数之多，居全城八十余家商号之首，这些钱铺经营钱币兑换和存款划拨。

清朝中叶以后，南阳绸缎、玉器等手工业技术异常发达，产品行销沿海及海外，宛城经济活跃，商贾济济，善于经营的秦、晋巨商多来此开设店庄；本城的丝绸布匹行业亦开始到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地设庄联号。埠际间货款结算、款项调拨，始在各庄内部用“庄票”进行清算。由于“庄票”具有携带、邮递之便，减少意外损失等特点，逐渐得到庄外客户的赏识，故多委托其代解款项。是时，宛城钱庄已顺时昌盛。

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年），意大利传教士在宛城西部靳岗筑寨、盖教堂，设教区期间，其浩大费用全以汉口法租界内银行解付的“洋票”（教堂开发的汇票），卖给本市的钱庄或采购商，换取现款，籍应开支。“洋票”较有信用，售价较高，比一般“汉票”价，高出一二十元（每千元票价在九百八十元左右，至汉口后可兑取一千元。）由于有利可图，竟相争购，同时也促进了当地货币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。到清末民初，宛城先后曾建立泰兴恒，恒盛源，裕丰

恒，荣泰祥，恒心诚，久成，瑞增，同茂恒，复成仁等九家钱庄。

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九年（公元一九三〇年）间，由于丝绸业的发展，聚成仁、久成号以绸缎运销上海并与瑞士等外商联系，以及帝国主义买办势力渗入，太古、德士古、亚细亚、怡和等几家外国公司在宛设立分支机构，一时洋货充斥市场，本地土特产外运，以及工业原料输入日增，款项调拨频繁，宛城钱庄业随之剧增，又先后开设志合永、万福恒、福盛长、福康、协汇通、义聚恒、三义合、恒聚源、慎昌大、同和裕、意利、大有等十余家钱庄，金融市场，异常活跃。

民国二十年（公元一九三一年）至民国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国内军阀混战结束，南京政府控制全国，政局渐趋稳定，农业生产日趋恢复，民族工商业走向兴盛，除市内原有一些钱庄复苏外，又相继开设了祥兴、汇廉、谦祥永、振予、和西安德泰祥钱庄南阳分号，宛城商业和金融市场呈现特殊繁荣。

民国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九三七年），抗日战争爆发，豫北沦陷，开封省府机关、学校、战区军队纷迁宛区，人口据增，商业畸形繁荣，投机商人云集宛城，资金往来为了逃开当局查禁，大多依靠私人庄号汇划。因之，宛城钱庄业更趋兴盛，原经营食盐、杂货业的亦先后转入钱业，如巨业盐号、和昶、恒聚永、协盛等。

随着银钱业的蓬勃发展和形势的需要，宛城曾有“钱集”组织的产生，即由资金雄厚，在票据市场有举足轻重的钱庄所组成，设在福康号内，每日上午各家钱庄派一要员或经理到“钱集”，根据当日票据多缺，银根松紧，共同协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